

● XIANQINSHI XINTAN ●

先秦史新探

唐嘉弘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唐嘉弘 著

先秦史新探

河南大学出版社

先秦史新探

唐嘉弘 著

责任编辑 丘菊贤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周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3毫米 1/32 印张：13.875 插页：4 字数：351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4.50元

ISBN7—81018—106—8/K·12

序 言

徐 中 舒

先秦史的研究，从西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即已提到日程上，当时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在继承秦代大一统政局下，如何更有效的适应“暴秦”和楚汉之争后的现实条件，建立一整套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来为汉帝国服务。当然，同时也对先秦典章制度和社会历史进行一些清理和总结。正如我的老友顾颉刚教授在他写的《汉代学术史略》（后更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所论述的，秦汉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地排列出了一个先秦历史系统和序列。

战国时诸子百家为了针砭时弊，除提示富强方针外，还提出不同的历史哲学，以作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中阴阳五行思想在秦代焚书坑儒、毁灭文化以加强专制主义，从而导致全民文化大倒退的时代背景下，颇为流行，信奉的人不少。汉代知识分子便因势利导，将那些简单的易于流行的带有迷信因素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谶纬学说加以利用，加以系统化，甚至神秘化。一时“五德”说、“三统”说、“天人感应”说等等玄学和迷信，甚嚣尘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也难免或多或少的受到相当的影响。在这种人为的欺世惑俗的并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以及宇宙观、世界观的流传散播中，汉代不同时期的统治集团均按自己的利益组织宣传，企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惜，先秦历史却被他们以讹传讹，造成极大混乱，谬种流传，两千年来一直未能肃清。

F264/5310 · 1 ·

清朝乾嘉学派的学者对于澄清汉、唐以来的伪先秦史谬误作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微观研究颇能揭露历史实际，堪称独步千古。可以说，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的运用了批判的科学方法。

建国以后，考古材料大量出土，民族调查不断进行，并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这些宝贵的收获对于先秦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对解决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有颇大程度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在理论上起了指导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对于历史的研究同样非常有益。近年来，我国史学无论是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和二者的结合，均有喜人的进展。先秦史的研究也出现蓬勃发展的兴旺局面。

嘉弘同志多年和我一道工作，专治先秦史和民族史，具有相当宽广的基础知识和深厚的才识功力，在史料上和理论上均有高的修养，二者相得益彰。我们热烈讨论许多学术问题，往往看法一致，观点相同。近年来由于我年老事繁，我们讨论后由嘉弘同志执笔，合写了不少文章。我们认为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先秦史研究有所突破，求得先秦历史实际及其规律，要彻底的平反汉代的先秦伪史，要在世界“汉学”热潮中居于领先地位，治史方法上应该有所改进，传统的专治文献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将宝贵的大量的考古出土材料加以充分利用，并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同时，作为“社会化石”的现存民族的调查以及民族史志，也应予以重视，这些都是十分有用的参考资料。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确有不少共性，当然也有各族的个性，在相同发展阶段和相似社会形态的各族历史，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和相互印证？嘉弘同志在研究先秦历史时，常能将文献、考古、民族三个方面的资料联系阐述，相辅相成，进行论证；所以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上往往有所创获；其中不少论点，如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并未出现“三次大分工”，三代帝王称号及其政

体，“火长”、“莫敖”和“令尹”的源流，周原甲骨“楚子”的历史意义，三代的家长奴隶制，西周的畜牧、渔猎经济，稷祭源流，越国历史及其社会经济等问题均经长期思考和探索，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能发前人所未发，新颖可喜。

早在1956年我们即已拟订了一个较为庞大的整理研究先秦历史的计划，并开始付诸实践，当时新购许多线装先秦史籍，以供剪贴编纂，由几个同志共同开展此项工作。可惜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耽误下来，弃置二十余年束之高阁了。

近年来神州大地万象更新，振兴中华，发扬祖国传统优秀文化，历史科学新局面的春天到来了，先秦史学科亦呈现蓬勃繁荣的景象，嘉弘同志为了适应需要，拟将研究、讲授所写出的先秦史专题结集成册，史学园地中又出新枝，对于推动先秦历史的深入研究，对于先秦历史众多问题新的探索，均会起到十分有益的作用的。同时，热切期望先秦史学科的丰硕成果不断问世，继续获得长足发展。过去几年里，“中国先秦史学会”在团结、交流和协作先秦史学科的同行之间，作了大量工作，得到了有关同志的肯定。今后更应在加强团结的基础上更好的开展交流和协作，不断的探索先秦史广阔天地里的奥秘，为祖国四个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目 录

论黄河文明····· (1)

古代社会分工理论及其相关问题

——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发表一百周年····· (23)

试论夏商周三代帝王的称号及其国家政体····· (44)

关于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问题····· (82)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94)

论青川墓群文化及其政治经济问题····· (100)

殷商“作邑”及其源流····· (117)

“火长”考辨····· (127)

周原甲骨“楚子来告”新解····· (137)

略论春秋时代的变法改制和霸业····· (148)

“莫敖”和“令尹”

——楚官探源之一····· (158)

关于晋赵历史的几个问题

——兼论中国的骑马民族····· (181)

夏代经济形态新探

——兼论三代的家长奴隶制····· (211)

论殷周的外服制

——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 (230)

周代的家长制公社和农村公社

——兼论中国封建地主制的形成…………… (239)

论畜牧和渔猎在西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271)

关于越国社会经济的形态问题…………… (295)

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 (322)

《山海经》和“黄帝”…………… (330)

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 (339)

西周“高禘”的源流

——兼论巫术文化的历史地位…………… (362)

简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燎祭及其源流…………… (378)

论孔子的政治思想…………… (394)

孔子的教育思想…………… (409)

略谈《左传》和《国语》…………… (422)

后 记…………… (437)

论 黄 河 文 明

夏商周三代的核心地区均在黄河中下游流域，黄河文明就是夏商周文明。标志古代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十三经”产生于这个地区，其他标志古代文明的重要事物如较早的旱地农业复合体系、文字的发明创造、城市的兴建、国家政权的形成等，也同样最早产生于这个地区，而广大的南中国地区，直到汉唐仍基本上处于“火耕而水耨”的分散村社状态，唐宋以后开始逐渐繁荣昌盛。黄河孕育了中国文明，黄河哺育了中华儿女，人们常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完全符合古代历史实际。古代中原的华夏族人及其先民以黄河中下游为基地，不断地吸取周边异族甚至远到中亚的文化，与各个共同体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世界史上罕见的源远流长的文明大国。青铜铸造技术和琢玉工艺水平，三代达到很高的阶段，但鉴于西欧发明铁器之后，才摆脱野蛮状态；而玛雅文明却以石器作为物质基础，故本文不拟对它加以论述。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我们也可说：“夏商周三代是黄河的赠礼”。黄河是三代的大动脉，黄河的无数支流构成华夏——汉文化圈的蛛网式的基层经络。加上大运河与兴安灵渠，南北中国联成一片，中国文化景观焕然一新，发生新貌，各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为紧密的联接起来。

黄河全长5464公里，千回百折地流过黄土地带或次生黄土地带——中游的黄土高原和下游的华北大平原，黄河是和黄土分不开的，强烈的西北风吹来大量沙漠和戈壁的尘埃，堆积成为黄土。黄土质地疏松，便于农耕，有垂直柱状节理，是原始农业生产的适宜土壤，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许多原始人群在这里经营原始农业、采集、狩猎和畜牧的复合经济生活。黄土高原主要是风成的，而华北大平原本来是个大海湾，后来逐渐由黄河冲积而成。黄河挟着上游的大量泥沙滚滚而下，加上两岸山岭积雪的溶化以及季节雨水，夏秋之间常常上涨和泛滥，矿物质及淤泥、杂草混流卷下，许多支流两岸聚积了有用的天然肥料。从农业生产看，河水定期的适当的涨落是能起到相当促进作用的。汉武帝时关中民谣“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颇适于农作物的丰收。王莽的大司马张戎也说：“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黄土高原上，“周原赳赳，萑茶如飴。”从有利条件方面考察，黄河流域应是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好地方。古代交趾西欧雒人，“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水上下，民垦食其田，谓之雒民。”（《汉书·地理志》）大概利用河水涨落的天然肥料种植，是古代农民带有共性的事物。

另一方面，黄河易决易溃，经常泛滥成灾，特别是在政治腐败，争战杀伐时，管理不善或有意破坏，确给沿岸特别是下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祸害。但是，艰苦环境对培养民族性的勤劳勇敢和坚韧上进大有好处，华夏先民受到极大锻炼。甚至黄河流域众多氏族部落的联盟及统一国家的形成，也与黄河的治理和灌溉事业的需要有一定关系。中国文明的起源和黄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古代中国人把黄河看作作超凡入圣的神灵加以崇拜敬奉，把黄河看作生命线和生命的源泉，长期的隆重的祭祀“河伯”或“河”以及有关的许多神话，都说明黄河对华夏先民的生存和经济生活关系的密切。

古代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和现代大不相同。

根据陈正祥先生的研究，黄土高原的植被主要是半干旱草原，黄土本身也是干旱气候的产物。它是东边是水热条件较好的华北大平原，西边的雨水则较黄土高原更少，是畜牧或游牧地带。黄河中下游部份地区，特别是一些山区、沼泽、丘陵和低洼润湿地区，也有不少森林。中国从渤海岸边向西直到新疆，再横渡中亚细亚，到达土耳其中部，基本上是一长条连续的大草原和半荒漠地带。从远古以来，东西地区的人们及其文化已经有所接触，有所联系，相互往来，相互交流。这个地带上有许多的不同族属的共同体，他们或以渔猎为主，或以畜牧为主，或以农业为主，过着采捕、渔猎、畜牧、农业的特殊的复合经济生活；其时任何一种生产手段均不能满足共同体成员生活资料的需要，不能维持全年的生计。

三代及其以前黄河流域的气候，似较现代稍暖，植被未遭破坏，水土不易流失，生态环境显然较现代为佳，加上地广人稀，无论狩猎、采捕农耕，均较易生存；在人口不断增殖和人的素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首先得到开发，成为汉晋以前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区，决非偶然。竺可桢先生在他的名文《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4期）论及古代气候：约从仰韶到殷商，大部分时间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2°C 左右。一月温度约比今高出 3°C — 5°C ，其间上下波动具体情况，限于材料，很难说清楚。在此以后，有一系列上下摆动，其范围在 1°C — 2°C 。公元前1000年是最低温度时期之一。西安市附近在距今五千年前还有原为亚热带动物的水獭和竹鼠生存；殷墟安阳附近除水獭、竹鼠外，还有獐、水牛和野猪等亚热带生物，“殷人服象”及周人逐象南迁也说明黄河流域适宜象的生存，豫、冀、兖州之间气候条件尚好；西周春秋时代黄河中下游还有竹、梅等温带植物生存。一系列自然现象构

成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与此相反，植被复盖破坏，水土大量流失，泥沙随水沉积，河床不断抬高，大量湖泊淤塞，许多支流分水不畅。黄河泛滥成灾，恶性循环。唐代以后黄河改道和泛滥成灾的频率增大，和它的恶性循环有关。

战国中期前黄河下流在河北平原上决溢改道，呈南北不稳定摆动，“水性使然”，乃自然趋势，从而出海口也常有变动。中国历史上最早纪录黄河改道的是东周定王五年，但当时有两个定王，一为公元前602，一为公元前463年（东周贞定王，省称定王），尚难确定是谁，很有可能是公元前602年。《水经注》卷五：“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渚”，就讲的此次改道，流到天津出海。《汉书·沟洫志》也提及此事。对于黄河或其支流的决溢，大约很早就用筑堤防的办法对付，传说禹父鲧就采用此法以治洪水，无功被杀，联盟首领又改用禹去治水，禹全心全意治水，传说颇有夸大，实际上，正如孔子所说：“禹尽力乎沟洫，”不过组织力量，分片疏通而已。“水性就下”，清理河道，开通沟洫，自然可以减少水患。但到春秋以后，列国纷争，或因生产需要，或因战争需要，历史记载出现了堤防。如郑国子产说：“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指乃河流堤防决口。战国以后，大量修筑堤防，《汉书·沟洫志》说：“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犯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有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汉代的金堤，大都是黄河的河堤。据谭其骧先生研究，河北平原中部为黄河故道带。黄河下游河道沿今太行山东麓北流，春秋以前这里长期存在一片空白，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也难以发现，当时人们定居在近山麓地区汛期不能淹没的高地，广大

平原中部低地只能任其荒芜不治，因而很难形成聚落，更不可能形成城邑。到了战国时期出现城邑，都是进入公元前三世纪才见于历史记载，应在黄河两岸筑堤以后。河东的齐国和河西的赵、魏所筑河堤各距河25里，两堤之间就有50里，距黄河河床较远，蓄洪拦沙作用较大。但是，河堤愈多愈高，危险性就愈大，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出现“水田地上行”局面，河床淤积，水面高出陆地，一旦决口，滔滔横流，将大量泥沙带出堤外，水退后地面留下大量沉积泥沙，一定时间具有一定肥力，但久后排水不良，即引起土地盐碱化，再经风力作用于干河床和沙质沉积物，沙丘也随之不断形成，吞噬农田、房屋，破坏城市、交通，危害很大。总之，黄河中下游在先秦时期利多害少，加上周代沟洫制度的不断完善，最早得到开发，最先出现文明的标帜，最快摆脱蒙昧与野蛮，所以，相继兴起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在这里建立，中国古代文明从这里奠基，三代文明就是黄河文明的源头。

二

黄河文明的诞生，和农业的源远流长密切相关。

长江流域的稻作（水田）农业，颇为古老而先进，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它和黄河流域的禾粟（旱地）农业，大致同步；但南中国的许多共同进入青铜时代后，一直停步不前，甚至倒退，既未发明文字，又不能建立独立国家政权，远远落后于北中国，这些现象的出现，既与南中国各共同体的长期处于分散的狭隘的小天地中——村社组织，交通不便，封闭孤立等社会的和地理的条件不可分割，同时南中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各类农作物容易生长，“食物常足”，既少千金之家，又少冻饿之人，易于养成依赖环境和不需奋斗争生存的意识，易于满足现状，似亦有一定关系。黄河流域基本处于半干旱

草原地带，黄土既能利于原始农业，又能危害人民生活，众多的水系支流，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以及广狭不等的沼泽地带，大片的高原和冲积平原，形成黄河流域地理景观的多样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多样性就帮助人类增加本身的需求，能力、劳动资料与劳动方法”（《资本论》第1卷613页），华夏先民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中克服许多不利因素，从而增长才干，锻炼意志，求得长足的发展。

古代黄河特别是下游地区，支流众多，湖泊满布，它们一方面可以调节黄河水量，减少黄河的祸害；另一方面，能给华夏先民提供发展原始农业及多样的生活资料。梁惠王（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19年）在大梁（今开封市）附近开凿鸿沟后，黄河南岸形成以鸿沟为干渠的交通、河淮之间的水道系统，北岸的支流大多是黄河决口后冲刷出来的。鸿沟又名狼汤渠、茆宕水，东汉时称汴渠，后又称汴河。它是联接黄河长江的重要水道，唐宋漕运的大动脉。淮河水系和海河水系都与黄河改道、黄河三角洲东南和东北冲积扇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史记·河渠书》说：

“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沟通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

“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韩国水工郑国修凿郑国渠，灌溉泽卤之地百万余顷，亩产一钟，关中号为沃野，秦国因以富强。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使魏国的河内地区富足。航行价值也是很大的，西汉武帝元封时（公元前110——105年）每年漕运粮食达到六百万石。黄河及其支流、沟渠所构成的水系，在利用原有古河道、支流和人工开凿后，形成先秦、两汉直到唐宋的极有价值的沟通黄河、长江的水利网，对中国历史上大统一的政治经济格局起了很大作用。早在春秋后期，吴、楚二国即已开

凿运河和兴修水利工程，有名的吴国邳城的邳沟，经由射阳湖北向沟通淮河、长江，并接通济水、泗水。《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辟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黄河水利网里，重要的都会有“天下之中”的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陈国都城淮阳、徐州彭城、睢阳、下蔡、寿春、临淄、曲阜、大梁（开封）等许多城市分布其间。

根据《禹贡》所记，在今河北以南，河南以东，泰山以西和淮河一带，有许多大小不等的湖泊，著名的有兖州雷夏泽（雷泽）在今山东濮县南，徐州大野泽（又名钜野泽）在今曹州一带，豫州有荥播泽（又名荥波泽）和孟猪泽（又名明都泽、盟诸泽），在今荥阳至商丘一线上，冀州有大陆泽，在今河北钜鹿一带，还有荷泽（今山东荷泽），圃田泽（约今河南中牟）等。《水经注》里也提到黄河中下游流域原有不少湖泽，沁、汾二河各有五、六个，渭、洛二河各有十余个。鸿沟故汴河以东，泗水、济水以西，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共有较大湖泊约140个。经过黄河泥沙的淤塞积填，除一部份为大运河的组成部分外，其余均先后消失了。山东丘陵的西侧湖泊群除大野泽外，后日的梁山泊、东平湖、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以及微山湖等，就是此湖沼地带的残留。先秦时期这些许许多多的湖泽曾经起了很好的历史作用。它们出产的各种物资，《周礼》中设有专人管理和开发，平民也可以按期前往进行采捕狩猎等活动以满足生活上的需要。同时，和黄河许多支流一样，还能调节水量、农田灌溉、水运交通、湿润气候以及平衡生态环境。如今郑州至中牟间的圃田泽，在战国时已成为黄河与鸿沟间调节流量的蓄水库，到了宋代仍是当时经济动脉汴河流量的重要调节枢纽。

许多湖泽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黄河下游冲积尚未达到完全淤填海湾的某些深点所致，另一方面，由于黄河多次决口改道，冲积平原上出现许多岗地（自然堤）和洼地（废河床），古代太

行山东麓河流冲积扇和西南、东北向的古大河河堤之间有许多交接洼地，形成河北平原上一连串湖泊，大陆泽就是其中之一。

徐中舒教授曾经详细论证，古兖州就是低地，是西边黄土高原和东边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丘陵之间的低地带。徐老用古文字构形论证兖州低地的位置、成因，和历史地理完全符合。《说文解字》：“兖古文字作，山间陷泥地，从，从水败兜，读若沅州之沅，九州之沃地也。”《禹贡》：“济河惟兖州。”这里本为黄河下游的冲积扇，当然属于低下沃地。正如上面指出的这里有许多湖泽，有黄河、济河，还有南边的淮河横亘其侧，春秋时期宋国和郑国之间还有六邑“隙地”存在，说明这一大片低地的开发是逐渐的缓慢的，是十分艰巨的事业。古代的“夷人”可能对这个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大的贡献。泰山附近地方狭小，遂向西拓殖，除了大力排水外，首先从事田猎，大量使用弓箭，夷人又称为“引弓之人”是有历史来由的。当时狩猎除了个人活动外，主要还是集体的用“打围”方法，大规模的共同行动以猎获畜群，后世辽、金、元、清的贵族统治者仍采用这一传统方法田猎，专设“围场”（古称苑、囿）以供狩猎或讲武之用。冲积平原的猎区，古称为“囿，方形，和西边黄土高原上随着原高低狩猎的“苑”呈宛延屈曲形不同。地理景观对文化景观的影响，从这个侧面也可反映出来。原始农业兴起发展后，用于田猎的“囿”不断地改造成为耕种的田地，加上冲积土壤的肥沃，农业在这里逐渐得到长足的发展。主要施行井田制度。《周礼·遂人》：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沟洫制度当为远古以来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逐渐修建的水利网。这样的水利网只有在广大的平原上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遂人”的职责是主管沟洫，对于一个完备的规模宏伟的

水利网如不经常维修管理，是不能发挥其排水和灌溉功能的。上面的“夫”是一个“五口之家”个体家庭的家长，一夫耕种百亩，和古史所记井田制下的耕作情况是一致的。《考工记》比《周礼》略晚，所记沟洫制的情况较为具体：“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一垅土），广尺流尺‘谓之畎（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八尺），深二仞（八尺），谓之浚，长达于川。”广大农村在先秦时期的主要农作物黍稷等，就是在这些水利工程排去积水以后所种植的。

西部黄土高原上，面蚀与沟蚀十分严重，在切割与侵蚀下，地面非常破碎，沟谷分布的密度很大，目前每方公里所拥有的沟谷长度可超过10公里，黄河平均含沙量达每立方米37公斤，祖厉河达457公斤，泾河达171公斤，为世界各大河流之冠。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即为黄土深厚，植被稀少，暴雨切割，地面破碎，水土严重流失。支流上的许多大型沟谷或河谷地带，颇为适宜发展农耕。由于黄土高原的降雨，主要集中于夏季，东南部地区的雨量，大致能满足旱粮作物生长的基本需求，这里的农耕主要属于旱农范畴。其中山西高原上的深切河谷和山前地带具备良好的灌溉水源；陕北、陇东高原的南侧和秦岭之间的渭河平原，古称关中，水热条件和黄淮平原相似，农作物可一年两熟，是一重要经济区，人口和城市均较集中；陇西高原雨量更少，古代主要是一牧畜地带，“牧而不游”，种植少量耐旱作物。

黄土高原的耐旱作物，通称小米或谷子，包括粟、黍、稷等，名称每易混淆古代对“五谷”、“九谷”的考订论著不少，多因缺乏实践知识和它们的种属繁多不易区分，尚难确指。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原的华夏先民已经采择当地原生植物粟、黍、稷等加以驯化培育，少数培养成功，大多数其它种属至今仍